

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国际中文教学研究 ——以北京故宫为例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al Art through the Lens of Cultural Semiotics——Take The Imperial Palace as an example

李瑞云¹

LI RUIYUN

华侨崇圣大学, 泰国&广西艺术学院, 中国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Thailand & Guangxi Arts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bellalry@163.com

李志艳²

LI ZHIYAN

广西大学, 中国

Guangxi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lizhiyan120@163.com

Received: 14 January 2024 / Revised: 07 June 2024 / Accepted: 16 June 2024

摘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文化符号学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 以举世闻名的北京故宫为研究核心。首先, 本文对文化符号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细致地梳理, 涵盖符号的定义与属性、以及它们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 尤其聚焦于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 如文化符号域、洛特曼文本观, 以及符号在文化传递、意义生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随后, 通过历时性研究方法, 本文追溯并分析了故宫建筑文化符号的演变历程, 探究了故宫建筑风格的变迁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动因, 揭示了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发展轨迹。进一步而言, 本文深度剖析了故宫建筑中的文化符号, 包括建筑布局、色彩应用、图案设计等多个维度, 揭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此外, 本研究着重探讨了如何将故宫的文化符号有效地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的课程体系中, 教学将引领学生探寻故宫中蕴含的丰富文化符号及其深层象征意义, 如龙图腾等皇权象征以及其他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通过这一探索过程, 学生将逐渐认识到故宫如同一部生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百科全书。本文还设计了以中轴线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课程作为教学示范, 目标是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提供新颖的教学理念和实践指南, 旨在增强学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中华文化的理解和兴趣, 进而促进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和交流。

关键词: 文化符号学; 故宫; 国际中文教育; 文化教学



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al art within 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cultural semiotics, with the globally renowned The Imperial Palace as its research nucleus. Initially, the paper meticulously examines the foundational theories of cultural semiotics, encompassing the definition and attributes of symbols and their profound interrelation with culture, especially focusing on core concepts of cultural semiotics, such as the domain of cultural symbols, Lotman's theory of text, and the pivotal role of symbols in cultural transmission, meaning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Subsequently, employing a diachronic research approach, the paper traces 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The Imperial Palace's architectural cultural symbols, exploring the transitions in architectural styles and their underlying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rivers, thereby uncovering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and developmental path. Moreover, this study profoundly dissects the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mperial Palace, including aspects like layout, color usage, and pattern design, revealing their extensiv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symbolic meanings.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into the curriculu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e teaching will guid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rich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ir profound symbolic meanings within The Imperial Palace, such as the Loong totem and other elements embod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is exploration process, students will gradually come to see The Imperial Palace as a vivid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values. In the meanwhile, this paper designs a cultural course centered around the central axis as a teaching demonstration, aiming to provide innovative teaching concepts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e goal is to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est in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al art and Chinese culture, thereby promoting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and exchange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Cultural Semiotics, The Imperial Palac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ultural Teaching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 研究背景

国际中文教育肩负着“国家与民族的事业”，不仅承担着汉语言文字教学的重任，也牢记着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2018年，国家出台了与国际中文教育息息相关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优化分布结构，加强力量建设，提高办学质量，使之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并强调了优化体制机制、提升办学质量等关键任务，旨在使其成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关键力量。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将中华文化推向全球舞台已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时代使命。这意味着，国际中文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促进中华文化在国际上有效传播，推进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厚而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载体和基石，它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担负着记录、反映和传承文化的使命。通过深入探索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我们能够洞察到这个民族丰硕的物质文化和深邃的精神文化。同时，文化是语言的内在灵魂和深厚积淀，为语言注入了生命力和创造力。文化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也持续推动着语言的演变和丰富。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彼此依存，共同构建了精彩绝伦的人类文明。

与此同时，国际中文教育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教学，它应该与文化数学紧密联系起来，语言教学必然伴随着文化教学，这在学界早就形成了共识。外语教学的历程深刻昭示了一个不变的真理：任何形式的外语教学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思想文化教育的脚步。一个学生在接受一种外语教学，学习并掌握一种外语的同时，很自然地会了解该语言所属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浸润于语言教学中的该语言所属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民族理念、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思维方式。

近年来，将不同文化资源融入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俨然已成为研究的新趋势，比如传统节日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等，该领域的探索呈现多元化模式，研究视野逐渐开阔。其中，建筑艺术文化的研究虽有人涉及，但仅仅是萌芽阶段，仅有个别零星的研究，这显然是不够的。从文化内容和文化价值来看，建筑艺术文化尤其是古代皇家建筑艺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从文化内容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建筑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其体系之完整性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建筑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木结构体系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也在世界文化中熠熠生辉，与欧洲建筑和伊斯兰建筑并称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代表如北京故宫、曲阜孔庙和承德避暑山庄等，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足以见证其在全球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

从文化价值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故宫更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和核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中国古建筑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深厚的人文蕴涵，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故宫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堪称巅峰之作，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在皇家建筑上投入了巨大的智力、人力和物力，倾注了无尽的热情和心血。无论是传统的木质结构还是精湛的建造艺术，都代表着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意识和审美倾向。它们不仅凝聚了全国的智慧结晶，还展现了中国古代的智慧与哲学，体现了传统儒、释、道文化，动态地反映了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思想信仰以及其中蕴含的深厚的中华民族观念。这些建筑中所表现的阴阳、虚实、和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等，正是当今中国最深层的文化根基。

再回到国际中文教育，从教学需求来看，故宫文化符号是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化教学必不可少的部分。第一，中国文化对留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多留学生是怀着了解中国文化的强烈愿望来中国学习汉语的，中国文化正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有的被中国的民间艺术吸引，有的被中国的美食吸引，有的被中国的历史吸引，有的被中国的服装吸引，有的被中国的音乐吸引……根据学者邓时忠对自己所教百名留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是冲着神秘的中国文化而来，”（邓时忠，2006：3）因此留学生们愿意克服语言学习的枯燥乏味、晦涩难懂，为的就是一睹中国文化的“芳容”。如前面所述，故宫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其吸引力更是不言而喻，单单一个故宫，每年就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外国人。第二，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资源动态数据库的建设中，“中国建筑文化资源数据库”（图1）排在了首位，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子库名称	二级子库名称	三级子库名称	相关字段
文化教学 内容动态 数据库	一、中国物质文化 资源动态数据库	1.中国建筑文化资源数据库	名称、地点、年代、规模、建筑特点、历史变迁过程、意义、海外影响、国际影响
		2.中国服饰文化资源数据库	名称、民族、地域、年代、相关人物、评价、意义、国际影响
		3.中国饮食文化资源数据库	名称、口味、菜系、年代、地域、风俗、传承、品牌、代表人物、评价、国际影响
		4.中国器具文化资源数据库	名称、地域、年代、传承、民族、代表人物、规模、国际影响
		5.中国其他物质文化资源数据库	名称、地域、年代、影响、传播、评价、规模、国际影响
	二、中国制度文化 资源动态数据库	6.中国典章制度数据库	相关著作、人物、年代、内容、版本、流传情况、意义、影响、研究情况、国际影响
		7.中国风俗习惯数据库	名称、地域、年代、相关人物、传承、服饰、评价、意义、影响、国际影响
		8.中国其他制度文化资源数据库	相关著作、代表人物、年代、内容、版本、流传情况、意义、影响、研究情况、国际影响
	三、中国精神文化 资源动态数据库	9.中国哲学、宗教数据库	相关著作、代表人物、年代、内容、版本、流传情况、意义、影响、评价、研究情况、国际影响
		10.中国文学作品数据库	相关著作、代表人物、年代、内容、版本、流传情况、意义、影响、评价、研究情况、国际影响
		11.中国科技发明数据库	名称、相关著作、代表人物、年代、内容、版本、流传情况、意义、影响、评价、研究情况、国际影响
		12.中国艺术审美数据库	书法、绘画、雕塑、篆刻、音乐、舞蹈等的名称、年代、地域、代表人物、传承、规模、历史评价、国际影响
		13.中国其他精神文化产品数据库	名称、相关著作、代表人物、年代、内容、版本、流传情况、意义、影响、评价、研究情况、国际影响

图1 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内容动态数据库建设框架

（图源：于小植. 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资源动态数据库的建设[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6(02):40-48）

然而，从实际的教学实践来看，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教学内容和价值并未得到与其内在重要程度相匹配的体现。为了深入了解这一问题，本文对泰国部分高校，如华侨崇圣大学、宣素那他皇家大学、蓝康恒大学、也拉皇家师范大学等所采用的文化课教材进行了细致地考察。同时，也对比了

中国本土出版的权威文化教材，如《中国文化常识》（国务院侨办和国家汉办联合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化基础》（舒燕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博雅汉语》（李晓琪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说汉语》（吴叔平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速成汉语基础教程》综合课本（郭元良、杨惠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郑铁生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国人说熟语》（徐宗才、应俊玲编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等。考察结果显示：首先，尽管大部分教材都涉及了“古代建筑”的内容，但它们往往只是泛泛而谈，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其次，古代建筑类词语文化内涵丰富，学习难度相对较大；最后，在日常教学中，由于中国文化知识摄入不足，学习者在建筑类词语的掌握上容易出现偏误。

鉴于以上背景和问题的考虑，本文斗胆引入符号学这一学科理论。“符号学”是一种新型研究工具，自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以来，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应用于在各种文化领域中，如广告、商品、明星、电影、图像、音乐、建筑、设计等，这其实也是符号学近年来最突出的表现。以文化符号学为切入点专门论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符号的国际中文教学的研究相对空白，本文将尝试围绕古代建筑艺术符号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有效传播与运用展开研究探讨，试图为当前文化资源教学寻求一定的新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意义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际中文教育不仅承载着教授语言的重任，更被赋予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崇高使命。然而，当前的教学实践在这方面仍亟待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和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

本文的研究旨在弥补这一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本文创新性地引入文化符号学理论，为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通过文化符号学的透镜，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挖掘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揭示其符号体系背后的文化逻辑和传播机制，从而为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在实践层面，本文的研究致力于推动文化资源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广泛应用。针对当前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符号在文化教学中应用研究的不足，本文通过深入剖析理论和探索教学应用，为教师提供更加具体、可操作性强的教学建议和方法。这不仅有助于帮助留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文化精髓，还能有效提升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

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意义。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吸引留学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符号的有效传播与运用，本文的研究有望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综上所述，本文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符号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以及其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有效教学与传播，尝试为相关领域贡献绵薄之力，并希望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一些新的活力与思考。

二、研究范围、目的、主要内容、方法和创新性

(一) 研究范围

本研究致力于在文化符号学的广阔视域下，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丰富内涵，并特别聚焦于故宫这一举世瞩目的标志性建筑。研究范围涵盖对文化符号学理论的深刻剖析、对故宫建筑文化符号的细致解读，以及其历史演变的系统探究。同时，本研究还积极探索将这些独特的文化符号有机融入国际中文教育课程的创新策略与实践方法，旨在显著提升教学效果，加深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兴趣。

(二) 研究目的

1. 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开始关注文化资源在教学中的应用，但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传统节日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等，建筑文化（故宫）资源如何运用于国际中文教育中尚无专题性研究，本文尝试在此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学术探索。

2. 通过文化符号学全面剖析中国古代皇家建筑艺术符号如何进行意义的生成与传达，构建中国古代皇家建筑艺术符号体系，深刻挖掘其背后所承载的意义，以及如何有效地进行文化传播。

3. 通过文化符号学梳理中国古代皇家建筑艺术在历史演进中的符号化过程，深入挖掘中国古代皇家建筑艺术符号的历史渊源，避免文化教学中“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4. 基于 AP 汉语与文化课的教学架构，将中国古代皇家建筑艺术符号与文化教学有机结合，同时为文化教学资源动态数据库建设和文化教学教材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三) 研究主要内容

本文致力于在“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国际中文教学”领域开展深入探索，并以故宫为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剖析。整个研究框架精心划分为四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核心部分。

第一部分：文化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在这一部分，本文将对文化符号学的基础理论进行全面梳理，确立符号的定义、属性及其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将深入探讨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如文化符号域、洛特曼文本观，以及符号如何在文化中起到传递信息、表达意义和构建认同的作用。此外，本文还将特别关注文化符号学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探讨如何运用文化符号学理论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和文化认同感。

第二部分：历史视角下的故宫建筑文化符号演变

在这一部分，本文将采用历时研究的方法，对故宫建筑文化符号的演变历程进行追溯和分析。本文将从故宫的建造背景入手，探讨不同历史时期故宫建筑风格的变化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同时，本文还将关注故宫建筑文化符号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承与创新，以及这些变化如何

反映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发展性。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全面地理解故宫建筑文化符号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部分：故宫建筑文化符号的深度解析

这一部分将聚焦于对故宫建筑文化符号的深入分析，涵盖建筑布局、色彩运用、图案设计等多个方面。我们将通过详细的观察和解读，揭示这些建筑元素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例如，故宫的布局规划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和皇权思想；色彩运用则彰显了皇家的威严与尊贵；图案设计则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和审美理念。同时，我们还将关注这些建筑文化符号在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方面的作用，探讨如何将其有效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的课程体系中。

第四部分：故宫建筑文化符号与国际中文教育课程体系的整合

在这一部分，本文致力于探索如何将故宫的建筑文化符号有机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的课程体系中。首先，本文将分析当前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的现状和不足，明确故宫建筑文化符号融入课程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接着，本文将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特点，设计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例如，可以开发以故宫为主题的文化教材、设计互动式的文化体验活动等。通过一些比较新颖的教学方式，希望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参与度，提升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感。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故宫建筑文化符号的深入分析和教学实践探索，旨在为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提供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论指导。我们期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加深学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中华文化的理解和兴趣，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

（四）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本文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广泛且深入的文献收集与阅读基础之上。通过系统性地搜集符号学、美学、哲学、建筑艺术、建筑史以及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等多领域的相关专业书籍、期刊文章和学位论文，旨在构建一个全面而细致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对各类文献资料进行分类归纳和深度分析，以提炼出关键观点，为本文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提供坚实支撑。

2. 对比研究法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对比研究法得到充分运用。一方面，在考察文化教材中“建筑艺术”的相关内容时，本文选取多部教材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不同教材在内容选择、呈现方式以及教学理念上的差异与优劣。另一方面，在研究古代皇家建筑艺术符号时，本文注重从宏观与微观、共时与历时等多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3. 跨学科研究法

本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符号学为主要分析工具，对古代皇家建筑艺术符号进行深入剖析。同时，本文注重将研究成果与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相结合，探讨如何将符号学理论与实践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当前，符号学以其强大的解释力和广泛的应用性正逐渐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成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本文的研究工作正是顺应这一科学大趋势，旨在推动符号学与相关学科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五）研究创新性

1. 理论运用创新

第一，本文不仅从共时层面探究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符号的意义生成与传达，而且从历时层面展现其符号化过程，可视为是一种新的探索。第二，将符号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符号与文化教学相结合，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

2. 研究方法创新

从“文化符号学”视角切入、多学科、跨领域融合创新，从共时和历时两大方面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符号作深入剖析，构建中国传统建筑符号体系，同时将其运用于文化教学，力争使研究成果对实践操作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3. 实践创新

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符号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具体过程中，是基于当下热门的教学模式 AP 汉语与文化课进行的，这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使之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及现实价值。

三、与本论文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关于文化符号学的研究

1. 国外文化符号学研究

文化符号学是在索绪尔和皮尔士符号学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学科，主要研究符号在文化领域中的应用和意义。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分析重点在于语言符号，而皮尔士的理论则更广泛，涵盖各类符号系统。20 世纪 60 年代初，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在苏联兴起，标志着结构主义诗学和文艺符号学的发展。这一学派不仅关注文本分析，还扩展到文化符号学的更广泛领域，如文化传播、社会

结构及其历史变迁中的符号意义。

尤里·洛特曼是塔图尔——莫斯科学派的奠基人和领袖人物，他对文化符号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将结构主义方法扩展到更多样的符号系统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洛特曼的研究跨越文学之外，涉及艺术文本、民间传说、神话等，旨在揭示这些文化形式背后的深层意义。洛特曼的理论强调文化中符号的重要性，探讨了文化符号如何构建意义、如何被社会接受和理解，以及它们的演变过程，在解读文化现象、理解文化变迁和文化交流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其中，最震撼全世界的代表作有三本：一是《文学文本的结构》（1970 年出版），洛特曼对文学文本进行符号学分析的尝试。在这本书中，他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探讨了文本中的不同层次如何共同作用来创造意义。洛特曼分析了文学文本中的各种符号元素，如情节、角色和叙事技巧，并考察了这些元素是如何互相联系、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这一理论不仅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理解文化符号学中的文本结构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二是《思维世界：文化符号学理论》（1990 年英语版，1999 年俄语版），这部著作是洛特曼在文化符号学领域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文化符号学框架，他将文化视为一个由符号构成的复杂系统，并探讨了符号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产生、传达和演变。他分析了文化中的各种符号形式，如语言、艺术和日常实践，并探究了这些符号如何相互作用以产生文化意义。这一理论极大地拓展了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为理解文化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三是《文化与爆炸》（1992 年出版）：在这部作品中，洛特曼探讨了文化变迁的过程，特别是文化中的创新和变革如何发生。他将文化变迁比喻为“爆炸”，强调文化发展并非平稳连续的过程，而是由一系列剧烈的变化和转折点构成。这本书深入分析了文化的动态性，探讨了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导致文化的重大变革，该专著为理解文化发展的非线性特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2. 国内文化符号学研究

国内学界由此开展了以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为中心的相关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关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学术解读研究。中国学者张杰、康澄在该问题上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共同撰写了国内首部深入研究 20 世纪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及符号学家洛特曼及其艺术符号学理论的专著——《结构文艺符号学》（2004），详细解读了洛特曼结构文艺符号学的核心理论。该书不仅阐释了洛特曼的理论内容，还从方法论的视角对其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探讨。此后还发表了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如张杰（2000）《走向体系研究的艺术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一文深入比较了塔尔图艺术符号学派和莫斯科文化符号学派，强调这两大流派与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区别，突出了它们在诗学研究和文化追溯方面的成就，并指出这些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和系统性。康澄（2005）的《文本——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全面解析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文本概念，着重阐释了文本作为意义和功能载体的重要性，分析了洛特曼对文本与语言关系的新理解，并探讨了其文本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康澄（2006）《文化符号学的空间阐释——尤里·洛

特曼的符号圈理论研究》深入探讨了洛特曼在 1984 年提出的“符号圈”概念等。其他学者如袁久红（1991）《文化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初探》，李肃（2002）《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发展概述》，郭鸿（2006）《文化符号学评介——文化符号学的符号学分析》，赵爱国（2008）《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系》和《洛特曼“四维一体”符号学理论思想论略》等均对洛特曼的学术思想进行细致考察和剖析，突显了洛特曼理论在启发思维和更新人类智慧方面的独特价值。

关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应用实践研究。在这一方面，我国学者通过对多种文化文本和社会现象的分析，充分展示了该理论的广泛应用和深刻阐释力。例如，李小华（2007）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符号的翻译》中探讨了龙、凤凰、麒麟等中国文化符号的翻译问题，提出了保留这些符号真实内涵的翻译策略；李丹（2007）在《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色彩文本功能意义的分析》中分析了色彩作为文化符号的独特作用，揭示了色彩在社会文化交流中的丰富功能和意义；陶悦（2018）在《果戈理〈外套〉的文化符号学观照》中运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剖析了果戈理小说《外套》中“小人物”形象反映的官僚体制，并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孔俐颖（2021）在博士论文《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中结合洛特曼、鲍德里亚和霍米巴巴的理论，分析了佩列文小说中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揭示了其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

尽管这些研究在运用洛特曼理论进行文化符号学分析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和实践经验，但在本土文化符号研究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的研究在深入挖掘和应用本土文化符号上相对不足。考虑到本土文化符号对民族精神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深化对这些符号的研究不仅能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and 保护，而且对于国际文化交流具有极大的意义。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例如，可以探讨建筑艺术、传统节日、民俗习惯等文化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它们如何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同时，我们也应积极探索洛特曼理论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中的应用潜力，如将其应用于文化传播、国际交流等领域，以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推动中国文化符号学的进一步发展。

（二）关于文化符号学与故宫的研究

因在知网上搜索两个关键词“文化符号学”与“故宫”，未检索到相关文献，故把范围稍微扩展了一下，搜索两个关键词“符号学”与“故宫”，搜索结果显示，截至 2024 年 1 月，共有期刊论文 22 篇，学位论文 54 篇，会议论文 3 篇，可归纳为以下四类：

第一，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方面的探索，这一类研究主要关注于如何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中。例如，赵玮程（2022）《符号学语境下的故宫文创产品设计研究》，田湘文和魏一鸣（2023）《基于符号学理论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策略研究——以故宫文创为例》等，都体现了如何利用符号学理论创新性地设计和解读故宫的文创产品。

第二，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与品牌构建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例如，庞嘉（2022）在《故宫文化符号解读与传播研究——以《上新了·故宫》节目为例》中，探讨了故宫文化符号在现代媒体中的

解读和传播。这类研究突出了符号学在理解和传播文化遗产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三，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与品牌构建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康琪、朱代根（2021）的《符号学视角下的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和王凌枫（2023）的《基于符号学的地域文化品牌构建策略研究》等，这类研究展示了如何运用符号学理论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和品牌建设中寻找灵感。

第四，在其他相关应用领域，学者们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杨苗（2017）在《从符号学视角看〈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走红》中探讨了符号学理论在解读影视作品方面的应用，而李红和董天策（2011）的《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召唤——“故宫窃案”的符号学分析》则是将符号学应用于公共事件的解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关于符号学与故宫，尽管已经为故宫文化的深层次理解和广泛传播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研究工具，但仍存在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加以解决。首先，从文献的数量上来看，现有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虽然已有的研究涉及了故宫文创产品设计、文化符号的解读与传播以及符号学在其他相关领域的应用等多个方面，但相较于故宫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和历史内涵，目前的研究成果仍显得较为单薄。其次，目前的研究在对象上存在一定的局限，即对于符号学与故宫相结合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了故宫的文创作品上，虽然这些研究在推动文化传承和创新设计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对于古代皇室宫殿本身所蕴含的符号学意义则缺乏深入的挖掘和分析。最后，现有研究在建筑符号的意义分析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尽管许多研究已经触及了建筑符号的语言功能及其常规的语义阐释，但它们往往忽略了将建筑符号作为一个整体性符号的符号化过程的深层次探讨，这种缺失导致了对建筑符号丰富内涵的揭示不够深入、不够全面。

（三）关于古代建筑艺术文化的研究

古代建筑艺术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哪一门艺术，能够像建筑这样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记录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其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古代建筑的技艺与美学，更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演进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以下将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朱启钤的《哲匠录》梳理了中国古代在建筑、水利、桥梁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开创了系统整理古代建筑人物传记的先河，深刻影响了建筑史学研究。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从艺术处理角度探讨了古代建筑的美学特征，提出对称、均衡、节奏、韵律等美学手法。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全面剖析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源流和风格，提供了丰富的建筑史资料。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分析了中国建筑的对称、均衡、和谐、精细等美学特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如潘谷西、郭湖生、傅熹年等，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了古建筑文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涵盖建筑史、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内容。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朱启钤、梁思成等留学生推动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文化研究，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和《营造法式》，深入剖析了古建筑的艺术特征，标志着研究进入新阶段。梁思成、刘敦桢的弟子如莫宗江、罗哲文、傅熹年，

从美学角度探讨了建筑的装饰造型和空间艺术规律。萧默主编的《中国建筑艺术史》全面阐述了建筑艺术的发展史。王振复的《建筑美学笔记》从文化和哲学角度探讨了传统建筑的艺术美及其背后的文化根基。

综合以上学术成果，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古代建筑艺术的认识和理解，更为我们探索当代建筑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同时，这些研究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持久魅力和深远影响。

(四) 关于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的研究

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化教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在中国知网上以“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为主题进行检索，经核对筛选出学术成果共计 3326 篇，通过图 2 我们可以发现，以 2012 年为界，2012 年是论文发表量首次超过 300 篇，2012 年之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的相关论文，相比之下，发表数量较少，但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 2012 年到 2019 年间，虽有较大幅度上下波动，但每年文章发表量均在 300 篇以上，研究热情空前高涨。2019 年至今，论文发表量呈现下降趋势，但基本维持在每年 250 篇左右。在 3326 篇论文中，学位论文 1736 篇，期刊论文 1590 篇，学位论文比期刊论文数量还多，这与我国近年来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息息相关。另外 2007 年 5 月 31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首次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 25 所高校开设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此后国内开设该专业的高校不断增加。研究生们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不断探索，硕士学位论文发表数量增加，由此推动了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研究的发展。有关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的探讨成果丰硕，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根据学界不同时间段讨论的热点和专家学者的建议，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可分为以下六大类进行综述，分别是国际视野下的文化观念与文化传播研究、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研究、文化教学的定性定位研究、文化教学的内容选择研究、文化教学的原则问题研究、文化教学的策略方法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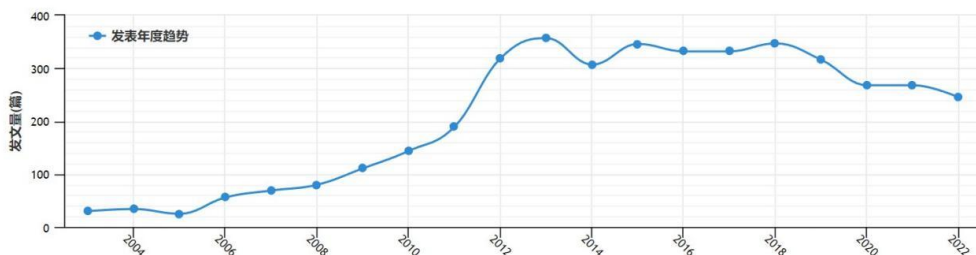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知网以“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为主题的论文发表数 (图源：知网)

在现代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文化教学研究的重要性已日益凸显，成为推动该领域发展的关键力量。以下是对当前文化教学研究的综合评述：

首先，近年来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教学

不仅是对语言教学的有益补充，更是实现文化传播和加强国际交流的重要途径。通过更加深入细致的文化教学，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全面地理解中华文化，进而提升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推动中国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课堂文化教学的深入研究正逐渐成为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者们致力于探索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更有效地融入文化元素，提出了众多富有创新性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这些研究不仅关注文化内容的选择和组织，还注重教学方法的设计和实施，力求使文化教学更加生动、有趣且高效。

再者，文化教学研究正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学者们正热衷于探索各式各样的文化教学理念、方法及策略，他们不仅着眼于文化的表面展现，更致力于深入挖掘不同文化的深厚底蕴。以中华文化深层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的探讨为例，这种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文化教学的视野，为学习者提供了更为多元、深邃的文化沉浸体验。

最后，实证性研究方法在文化教学领域的应用也逐渐显现出其价值。通过对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实际考察和评估，研究者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现有文化教学模式的优缺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这种以数据为依据的研究方法，为提升文化教学质量提供了有力支持。

与此同时，文化教学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但尚未得到充分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教学效果的提升。

第一，许多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存在不足。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的概述，而在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方面则表现得相对薄弱。这种宏观的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教学实践的有效指导，也阻碍了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二，文化教学在实际应用中所遇到的针对性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何根据学习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精准定制文化教学的目标和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推进文化教学过程中需认真考虑的关键问题。然而，实际上这些问题常被忽视，导致文化教学缺乏针对性，影响教学质量。

第三，从知识传递的角度来看，现行的文化教学同样存在局限。大多数教学仅使学习者了解事物的表面现象（“知其然”），却很少深入探讨事物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逻辑关系（“知其所以然”）。这种教学方法不能满足学习者对深度知识的追求，也不利于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and 创新能力。

第四，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是当前文化教学中亟需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虽然理论探讨已相当丰富，教学模式和方法层出不穷，但如何将这些理论有效地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仍是一个挑战。这种理论与实践分离的现状不仅影响了教学效果的提升，也限制了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总体来看，文化教学研究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然而，在全球化日益盛行的今天，为了更好地满足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我们仍需在研究的深度、针对性、知识传递的效能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等方面持续努力，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提升与完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提高文化教学的实效性，推动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理解，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五）关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研究

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与文化教学的结合方面，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硕士学位论文，但专门探讨故宫文化符号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研究文献却相对稀少。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从文化和词汇两个维度展开，探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中的实际应用。

第一，文化维度：李梦圆（2017）和张晓慧（2020）等的研究着重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他们坚信，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不只是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入口，更因其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鲜明地域特色，能够生动地展现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审美取向以及文化习俗。这些深入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它成为了一条有效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

第二，词汇维度：杨美林（2018）和二龙（Mohammed Abdalslam Hussin Ibrahim）（2020）等人的研究则聚焦于对外汉语教材中建筑类词语的教学。他们指出，建筑文化词语在对外汉语教材中占据一定比重，这些词语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还深刻反映了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这些研究探讨了如何在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中有效讲授建筑文化词语，并充分挖掘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

尽管如此，专门针对故宫文化符号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研究仍显不足，这表明故宫文化符号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中的应用和传播尚待进一步开发。未来的研究可以积极探索如何将故宫丰富多彩的文化符号融入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之中，以增强教学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

（六）研究综述小结

总的来说，为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提升教学质量，从文化教学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学界推崇将不同的文化资源与文化教学相结合，但同时要注意进行纵深研究，要有针对性，能够严谨深入分析具体问题，尤其要避免文化教学停留在使学习者“知其然”，却很少使学习者“知其所以然”。

再者，考察目前文化资源的研究现状，发现故宫是传统建筑的代表和核心，历史最悠久，体系最完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很高的文化价值，但学界目前无人对其做专题论述。

其次，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研究现状来看，目前的成果是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直接应用于文化教学，但简单地将文化通过语言传递出去，这显然是不够严谨的。如前文所述，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皮尔斯也指出“我们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通过符号获得的”，还有深受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社会符号学影响的“全美应用语言学协会”前会长克拉姆契（Claire Karmusch）也认为语言不可能在对信息未加重塑的前提下原封不动地传递信息。可见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最后，学界认为，文化教学多元化，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与探索，但研究多数停留在宏观理论的介绍和对文化教学的启示，缺乏深入地探讨怎么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进行有机结合，缺乏深入

细致的研究，这也给了本文重要的提示和启发。

四、结语

通过对北京故宫这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瑰宝的细致研究，本文深入探讨了文化符号学在文化现象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剖析了故宫文化的符号化过程，与此同时，进一步讨论了如何将故宫丰富的文化符号融入国际中文教育，以提升其教学效果。

第一，文化符号学既是理论又是方法论，本研究凸显了其在理解和推广中国文化，尤其是故宫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对文化符号学的理论背景、核心内涵及其运作机制的深入探索，为我们理解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提供了深刻而全面的视角。文化符号学强调文化的持续演变和多元互动，揭示了文化如何通过吸纳新元素和与其他文化的交融而不断发展，彰显了其非线性的发展轨迹和旺盛的创新活力。这一理论框架为分析故宫文化符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能够超越物质层面，深入领悟其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第二，故宫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在文化符号学的透视下，其丰富的符号化过程和多维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故宫不仅是中国古代皇权的象征，其建筑布局、设计理念和装饰艺术更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社会制度和艺术美学的精髓。通过深入分析故宫的符号意义，本研究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国际中文教育注入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三，本文强调将故宫这一独特的文化符号有效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性，这对于提升教学的吸引力和深化学生的理解至关重要。通过实地调研和与专家、一线教师的深入交流，我们发现故宫文化符号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中的潜力远未被充分发掘。因此，有必要通过系统的教学策略和创新的教学方法，将故宫文化的深刻内涵和象征意义融入教学实践，以丰富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激发他们对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情。

综上所述，本研究着重强调了文化符号学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尤其是故宫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并揭示了当前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为了提升教学的深度和效果，未来的研究和教学实践应致力于探索如何将故宫等文化遗产的符号系统更有效地融入国际中文教育之中。



参考文献

- 邓时忠. 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学思考[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04):1-4.
- 郭锦桴. 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8.
- 柯彼德. 汉语国际化的若干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03):1-9.
- 李泉.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七十年[J].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04):49-59.
- 李晓琪主编.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 陆俭明. 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J]. 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5, 26(02):79-84.
- 梁思成. 中国建筑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 梁思成. 清式营造则例[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9.
- 萧默主编. 中国建筑艺术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2.
- 于小植. 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资源动态数据库的建设[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6(02):40-48.
- 赵金铭. 国际汉语教育的本旨是汉语教学[J].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2013(00):11-18.
- 赵贤洲. 文化差异与文化导入论略[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01):76-83.
- 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7.
- 周丹. 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话语表述与内涵构建——基于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符号学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1, 19(05):71-79.
- 皮尔斯. 论符号[M]. 赵星植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31.
- Лотман, Ю. М., Лотман, М. Ю. Семиосфера. [M].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00.
- Lotman, Y.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M].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Salupere, S., Torop, P., Kull, K. (Eds.). Beginnings of the Semiotics of Culture. [M]. Tartu, Estonia: University of Tartu Press, 2013.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LI RUIYU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Huachiew Chalermparakiet University Guangxi Arts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ddress (地址) : - 18/18 Debaratana (Bangna-Trad) Rd., 18k.m. Bangchalong, Bangphli, Samutprakarn, Thailand - 8 Luo Wen Avenue, Nanning, Guangxi, China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LI ZHIYA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Doctoral Degre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Guangxi University, P.R.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ddress (地址) : 100 University East Road, Nanning, Guangxi, P.R.China

